

佛本之争与佛道之争的比较

李明

(西藏民族学院政法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要 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本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二者在其历史过程中都受到了佛教的重大影响。在佛教传入之时,道本二教同佛教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道教从佛教身上汲取营养,发展为与儒佛并立的成熟大教,本教最终被佛教所湮灭,表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种不同结果。

关键词 本教 道教 文化的碰撞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07)01-0044-03

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本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二者在其历史过程中都受到了佛教的重大影响。本文想对道本二教在佛教这种外来文化挑战下的反应进行比较研究,以加深对汉藏文化以及不同文化间冲突与融合的理解。

一、道教和本教的原初

道教源远流长,其文化因子可以追溯到远古,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形态正式诞生于东汉末。两汉时期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定型阶段,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大方向。儒学成为官学后,在“天人感应”的思路下出现了“返祖”的神学化的倾向,社会上谶纬迷信盛行,道教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孕育的。它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以走向民间的黄老学说为核心,糅合古代国家民族宗教的信仰和巫术、秦汉时的神仙方术、易学、阴阳五行、谶纬等等建立起一个新的宗教思想系统,实为各种民间信仰的集成,成为主流儒文化的一种重要补充。东汉顺帝时,张陵倡导五斗米道,建立起教团组织,尊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东汉灵帝时,张角创建了太平道,奉《太平清领书》为主要经典,依托神道为人治病,有徒众数十万,最终演变为导致东汉灭亡的黄巾起义。这是道教创立之初的情况。

本教是青藏高原自古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产生于西部的象雄地区,是一种类似于萨满教的原始宗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过早期伊朗文化的影响。其产生的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本”这个字的最初含义可能是指神坛,进而把依靠神坛进行宗教活动的巫师称为“本”。本教的发展可以分为笃本、恰本、觉本三个时期。佛教传入前的本教已经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恰本时期,它渗透到了藏族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传说第一代的聂赤赞普就是由本教徒拥立的,而且自聂赤赞普至拉脱脱日年赞,二十七代赞普都是以本教治国。可见,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本教是吐蕃文化的核心。

本教是一种典型的原生型宗教,而道教既不是典型的原生宗教也不是典型的创生宗教,而是介于二者之间。道教实为将春秋战国以来从国家民族宗教分化出的种种术法和信仰重新综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更高文化层次的新宗教。二者都有自然崇拜,本教认为天有天神,山有山神,森林有树妖,江河、湖水、山泉、地下皆有龙,中原古代也同样盛行着自然崇拜,《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这些诸多的自然神灵大部分为道教所吸收。但是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崇拜,神仙不同于一般的鬼神,他们是通过修道而能长生不死、具有广大神通的人,明

[收稿日期] 2006-03-23

[作者简介] 李明(1983-)男,山东泗水人,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政法学院2004级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显地比自然崇拜要高级。二者宗教行为中都有着驱鬼、求雨、占卜等巫术,但道教最重要的法术确是养生术、炼丹术、点金术、房中术等较高级的法术。本教和吐蕃的政治紧密联系,其主要活动是属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祭祀、盟誓、葬仪等,道教的根基却在民间,其早期的主要活动是以神道治病,关心民间疾苦。另外,道教思想中融会的道家、阴阳五行等思想,都是很有水准的哲学思维成果,这为道教快速的成长和提升,最终成为与儒佛并立的大教奠定了基础。这表明了两汉时期的华夏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高度人文理性化进程的洗礼,已经早早地摆脱了原始状态,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水平。这是本道二教在面临佛教这种外来文明挑战时所处的不同的文化大环境,这也使得本道二教在与佛教碰撞时产生了不同的火花。

二、佛教的传入及其与本道二教的碰撞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它是当时印度产生的反对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中的一个主要派别。公元前6世纪乔达摩·悉达多在反思婆罗门教义的基础上悟出了一套使人摆脱人生痛苦的理论和方法,它通过转换思维方式来调节心理,让人达到无欲无忧的涅槃境界,来实现人生的解脱。在婆罗门教衰落的情况下,佛教发展很快,成为一个新兴的大教,建立起完备的教义、教法和僧团组织。从公元前3世纪,在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的扶持下佛教开始大规模地向外传播,迅速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大约在公元1世纪初经西域传入我国的中原地区。佛教的传入是有史以来华夏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的输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时的中国正处在思想文化的调整中,两汉时确立起的经学意识形态日益琐碎和僵化,丧失了思想的活力;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也随着门阀新贵的崛起而逐渐崩溃,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这两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了以“大一统”为前提的官方儒学的没落。士人们转而采借其他的思想资源来安顿身心,因儒学独尊而长期冷寂的老庄等道家思想被重新重视,这就产生了以老庄解名教的玄学思潮。社会的文化风气为之一变,儒学的独尊地位被打破,学术也由经学的章句转向了贵无崇虚的义理思辨,这就为讲“无”的道学和解“空”的佛学在精英阶层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佛教最初传入中原时被视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种种道术的一种,依附于黄老崇拜中求生存。佛教也借助于玄学的概念,用格义之法来翻译佛经。当佛教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之后,就逐渐摆脱了对道教的依附,二教为争夺生存

和发展空间,开始发生冲突和争斗。佛教凭借其世界宗教的深厚积淀,在竞争中很容易占据优势,而道教也借助华夏正教的身份来取得话语权。佛道之争早在西晋时就显露出了端倪,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根据老子西入流沙的传说,杜撰老子西游化胡为佛的故事,把佛看成老子的弟子,借以抬高道教,贬抑佛教。南朝宋时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借华夷之别来扬道抑佛。佛教也不遗余力地反唇相讥,强调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攻击道教经书的浅薄和作伪。道教在与佛教的争斗中全力弥补自身的不足,这就是道教的“清整运动”。道教一方面努力使教义与儒家伦理相合,涤除了早期道教的反叛色彩,另一方面采借佛教的戒律和组织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宫观道场。清整后的道教,从理论和组织上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摆脱了开始时的粗俗状态,对社会的影响也相对增加,变得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在南北朝混乱的时局下,佛道二教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竞争也非常激烈,二者在争斗之中同步壮大。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广泛传播,终于在华夏大地站稳了脚跟。道教也日渐成熟起来,成为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大教。佛道也常常借助皇权的力量打击另一方,出现了在皇权支持下的大规模的灭佛或者灭道运动,例如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隋唐时佛道二教都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时期,虽然唐代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但三教合一的文化架构已基本确立,佛道二教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入宋以后,儒学复兴,理学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佛道二教都趋向没落,佛道之争也逐渐平息。

佛教在公元7世纪前期传入我国的西藏地区,其时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他积极发展西藏文化,主动与尼泊尔和唐朝联姻。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都信仰佛教,入藏时带去了大批的佛经和佛像,为供奉这些佛像建立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这是佛教传入西藏的开始。松赞干布时还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松赞干布以后的两代赞普时吐蕃政局不稳,佛教的传播中断,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被置于密室,翻译的经典也荡然无存。赤德祖赞即位后,从唐朝迎娶金城公主,汉地佛教和汉僧再度回到吐蕃。赤德祖赞还下令收留了由西域于阗逃亡吐蕃的僧人,这引起了崇信本教的贵族的不满,终于在739年以吐蕃瘟疫流行为由把这些于阗僧人驱逐出境。赤德祖赞去世后,赤松德赞幼年即位,由大臣仲巴结辅政。仲巴结笃信本教,发动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赤松德赞成年以后重兴佛教,先清除掉了仲巴结等信仰本教的重臣,然后延请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入藏。莲花生在与本教巫师的斗法中获胜,他主持修

建了桑耶寺,并为吐蕃僧人剃度出家,佛教在西藏立足,佛本二教也渐成水火之势。赤松德赞在墨竹的苏浦地方主持了佛本大辩论,本教失败,于是赤松德赞下令让本教徒改信佛教,又令全体臣民盟誓“长信三宝,奉行佛言”,开始强制推行佛教,从此佛教在西藏获得了长足发展。赤松德赞之后的几代赞普均大力弘扬佛教,到赤祖德赞时达到了高潮,最后他被信奉本教的大臣暗杀。赤祖德赞死后,朗达玛即位,开始了严厉的灭佛运动,从此佛教在西藏销声匿迹了一百多年。

本道二教都同外来的佛教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甚至发生了灭佛这种极端行为,但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佛教传入中原时,道教也刚刚萌生,可以说二者在同一起跑线上,各有优势和不足,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缓冲空间,可以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而佛教传入西藏时,本教早已很盛行,面对佛教对自身地位的威胁,反应自是非常强烈,一开始就处在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出现了禁本和灭佛的反复。佛教在中原的广泛传播是从社会下层开始的,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所以可在灭佛后迅速地恢复;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却是从王室自上而下的,更多地借助了政权的强制力量,其基础是脆弱的,所以在朗达玛灭佛以后归于沉寂。灭佛背后的涵义也是不一样的,佛本之争的背后是赞普与贵族的权力之争,而由佛道之争引发的灭佛,实际上是专制皇权对于游离于控制之外的社会资源的过度膨胀的担心和干预,后世元宪宗时由佛道之争引发的对全真教的弹压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另外,在中原的佛道之外始终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存在,在儒家的政治设计下,佛道都只是“神道设教”的治世工具,佛道的冲突不可能无限地膨胀,也不会动摇社会的根基,而吐蕃时的西藏尚处在由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社会向以地缘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过渡之中,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不强,主要靠赞普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系。佛本之争的激烈动荡,直接威胁到了赞普王权的稳定,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社会整合进程的倒退,也导致佛本二教丧失了发展的源动力,双双元气大伤。

三、本道二教与佛教的融合

本道二教在与佛教碰撞之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道教从成熟的佛教身上吸收了营养,保留且进一步突显自身的特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教在与佛教激烈冲突之后,两败俱伤,最终被卷土重来的佛教所湮灭。可以说汉藏文化在佛教传入时的不同表现是文明交流的两种典型:前者是传统文

化涵化了外来文化,后者是外来文化在大震荡后取代了传统文化。

佛道二教能够在华夏文明“独尊儒术”后兴起,根本上是因其弥补了儒文化架构本身的缺陷。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已高度人文理性化的知识精英的治世文化,其价值体系推向整个社会时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英和大众之间的价值错位,其“礼”更是在国家强制力量下的外在的行为规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缺乏内在信仰的支撑。在汉代与儒家紧密结合的古代国家宗教遗存,更多地成为了一种仪式化的官方祭典,宗教色彩大为降低,缺乏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儒学和国家宗教都满足不了人们的宗教需求,当时民众的精神世界是贫乏混乱的,其最主要的支撑还是以巫术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信仰。宗教需求长期处在被压抑和不满足的状态,把儒学神学化的努力,社会上宗教热情高涨,都反映出了这种需求的强烈。当帝国末世来临,其确立的整个社会秩序失控,长期被压抑的宗教需求就会迸发出来,这就是佛道二教兴起的内在的社会动力。佛教传入中原后,面对着的是一个已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要对自身进行调整,以迎合本土文明。佛教在中原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唐代时产生了完全中国化的禅宗。道教以夷夏之辨为立足点,以佛教为参照物,快速地成长起来,最后产生了成熟的道教形态——重玄学和全真教。我们可以说没有佛教作参照物的道教是不可想象的,但那夷夏之辨下所显现出的强大文化自信是不是道教能成功应对佛教挑战的“人和”要素呢?中唐以后儒学开始复兴,儒家在佛道刺激下,通过对先儒心性之学的再发现,完成了自身的终极架构。从此佛道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开始没落,佛道二教在民间信仰中进一步融合,达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这也表明了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完全地被华夏文化所涵化。

如果说佛教和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更多地表现为平等的对话关系,那么佛教传入西藏时则更多地表现为“小巫见大巫”似的不对称的竞争关系。在佛教的影响下,本教也曾像道教那样删改佛经充作自身的经典,以从理论上充实自己,本教也发展到了觉本时期。“觉”在藏语中含有染色的意思,也就是说本教已染上了佛教的颜色。但是,吐蕃执行的是禁本或灭佛的极端文化政策,缺乏文化交流的弹性空间,最后的结果是外来佛教的中绝和吐蕃社会的全面衰退。一个多世纪以后,佛教再次在西藏流传,在没有了王权和贵族权力斗争的干扰下,发展顺利,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本教徒要么改信佛教,

(下转 98 页)

气质、豪迈行为以及历史作用也足以使他们跃居于大人物、大英雄行列。司马迁以满腔的热情关注这些下层人士,正视与赞扬他们的历史作用。

第五,司马迁对游侠等社会下层人物的精神品格与作用予以热情的赞颂。

《太史公自序》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有者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他在《游侠列传》中称道游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作为史学家,他感到有一种深深的遗憾,这就是他在本文中说的“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由此可见他对于那些“闾巷之侠”的深深的敬意。他说:“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欺凌孤弱,恣欲自决,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15]P3183}。司马迁所称道的是游侠的品质人格,并将游侠同“暴豪之徒”进行了区别,以让世人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司马迁对《游

侠列传》的评论,表现了他对于社会普通人的、人格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他们历史作用与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

总之,《史记》通过记述中华民族各阶层人物奋发有为的精神和及时建功立业、显身扬名的功业追求,突出了人的社会历史作用,体现了司马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表现了中华民族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 [1]史记·礼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与挚峻书》
- [6]史记·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史记·淮阴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史记·陈涉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9]史记·项羽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0]《孟子·告子下》。
- [11]《报任安书》见《太史公自序》
- [12]史记·季布栾布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3]史记·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4]史记·商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5]史记·游侠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审稿 袁书会]

[校对 夏 阳]

(上接 46 页)

要么移居边远地区,势力日益衰微,本教被佛教所湮灭。这时佛本融合表现为许多本教仪轨为佛教所吸收,这与佛道的义理融合是不同的,是“术”层面上的融合。本教作为西藏的传统文化,在藏文化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实际上在佛教传入西藏的时候,藏族先民从自身的文化定势上已作出了选择,显宗大师寂护和密宗大师莲花生不同的遭际,禅宗在赤松德赞时辩论中的败北,都表明了这一点。后来,藏传佛教的形成,正是建立在西藏传统文化——本教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藏传佛教可以说是本教和佛教融合的产物。

从佛道、佛本的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这期间需要更多的理智与宽容,同情和理解,而不是傲慢与偏见,狂热和偏激。文化是一种自为的过程,过度

的政治介入,会极度扭曲文化交流的进程,甚至会导致文化的毁灭。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立足点,任何割裂传统的做法都是不可能的,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时,要多保留一份信心和从容。

[参考文献]

- [1]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2]牟钟鉴,胡孚琛.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M].济南:齐鲁书社,1991.
- [3]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审稿 乔根锁]

[校对 康桂芳]

Ethics Origin of Ancient Tibetan Law

He Xiaor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e original Tibetan law was made in early 7th century by Tubo dynasty regime which had local military and slavery characters. When newly formulated, Tubo law fully absorbed the ethics culture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Based on broad mass of Tubo ethics culture, Tubo law was made, carried out and gradually improved, and in turn strengthened this culture consistently. It's not hard to discover that the rich ethics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law of Tubo.

Key Words: Tibetan nationality; ancient times; law; ethics; origin

Contrast between Two Arguments: Buddhism against Benjiao and Buddhism against Taoism

Li M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aoism is the indigenous religion of Han nationality while Benjiao is the primitive religion in Qingzang plateau. Both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Buddhism in history. In early time when Buddhism was spread into China, both Benjiao and Taoism clashed vehemently with it, and they two themselves have some differences as well. By absorbing the nutrition from the Buddhism, Taoism develops into a mature major religion but Benjiao was overwhelmed by Buddhism eventually. This shows two absolutely different result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Benjiao; Taoism; cultural clash

Mounting of Tangkar and It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Fan Ke

(School of Ar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As a form of drawing in Tibetan cultural art, Tangkar has its unique traditional technique and clea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ousand years, it continuously absorbs and learns from other drawing forms of neighbor countries and area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rt of mounting Tangkar, from this one can figure out the importance of mounting to Tangkar draw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By doing so, its delicate art could be displayed and expressed on Chinese art stage.

Key Words: Tangkar, mount; color